·学术批评·

《学术界》(月刊)
总第209期,2015.10
ACADEMICS
No.10 Oct. 2015

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与金雅教授商榷

○ 莫先武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　要**〕金雅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建立在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之上,从纯审美理论中挑选、摘取术语,按照纯审美的理论模式构建了趣味人生论美学。实质上,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政治与审美二元融合思维基础之上的政治美学,具体表现为前期依附性的工具论政治美学,与后期本体论的乌托邦政治美学。金雅构建的梁启超趣味人生论美学体系,与梁启超的著述似乎相当贴近,但从梁启超的著述目的来看实质背反。

〔**关键词**〕梁启超;政治美学;趣味美学;二元融合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向现代转型中的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一方面,他在身前身后赢得声名无限,"论著遍传九州,声名远腾四裔",[1]社会各个领域都"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2]另一方面,他又如一颗流星,极为绚烂之后又迅速消失于中国现代长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梁启超研究又开始全面复苏,他再次进入现代学人视野。从1979年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以来,他的美学思想也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尤其2005年金雅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是"我国系统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第一部著作",[3]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领域"可谓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4]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提高到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度。那么,金

作者简介:莫先武,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论与美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13YJA751011),南京晓庄学院社科项目"梁启超政治美学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雅对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研究,是否符合梁启超美学著述的实际呢?

一

金雅认为,梁启超的美学是趣味美学。她说:什么是美?梁启超提出了"趣味"即美的本体性界定。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核心理论范畴。梁启超从中西文化中借用了"趣味"的术语,但却注入了自己的新的内涵。梁启超所界定的"趣味"既非中国传统文论中单纯的艺术情趣也非西方近现代美学中纯粹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梁启超的"趣味"是一种潜蕴审美精神的生命情趣,具有鲜明的人生实践向度与精神理想向度。[5]

金雅构筑的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体系,其要点有四:

其一,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他的美学就是趣味美学。金雅认为,在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中,趣味最有特色,也是"核心理论范畴",[6]是梁启超美论中的"本体范畴",[7]因此,梁启超的美学,就是趣味美学。

其二,梁启超的趣味美学经历萌芽期与定型期前后两个发展阶段。金雅认为,以欧游为界,梁启超趣味美学的构建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萌芽期和成型期:萌芽期自《变法通议·论幼学》开始,代表作则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惟心》,这一时期通过"力"与"移人"等范畴论述了艺术的审美功能,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础;成型期则从《欧游心影录》开始,代表作是《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等,这一时期梁启超重点论述了"趣味"这一美学范畴,用趣味勾连起人生的价值层面与艺术的情感实践层面,延续与深化了前期的美学思想,构建了以趣味为本体的美学思想体系。[8]

其三,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以"趣味"为核心范畴,由"趣味""情感""力""移人"四大范畴群构成的美学隐体系。金雅认为,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以'趣味'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石""以'力'为中介""以'移人'为目标";它的理论基础是"美的启蒙功能",理论目标是"美对人生的介入",四大理论范畴是趣味、情感、力、移人,理论形态是"以演讲辞与专题论文为代表的阐释方式",论证特征是"激情与逻辑相交融的言说方式"。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与"黑格尔式的显体系"不同,它具有自然鲜明的特色,它是一种"隐体系"。[9]

其四,梁启超所构建的趣味美学,其本质是人生美学。金雅指出,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主要回答这样四个问题:什么是美?如何建构审美的人格与审美的人生观?如何开展审美实践与审美教育?如何实现审美生存与现实生存的统一?梁启超的趣味美学,就是要解决"美、艺术、人生"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以哲学人生观为根基",将"人生精神、美学精神、艺术精神"联系在一起,即将人生与美学问题关联起来,通过审美解决人生的价值问题,因此,他的美学思想,其本质就是"一种人生大美学"。[10]

趣味与人生如何勾连?金雅认为,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趣味范畴,其本质就

是一种有责任的兴味,具体表现为“无所为而为”与“为而不有”的统一。梁启超一方面强调“为”,将其看作人类个体存在的“本然姿态”;另一方面,他所说的“为”,不是为个人利益打算之“为”,而是“要超越个体之‘为’的成败之忧与得失之执”,即要有“不有”的境界,这就是“无所为而为”,这就是“为而不有”。这样,不有之为的趣味之境,“既是梁启超的理想人生”,同时“也是梁启超的审美之境”。[11]如果说“无所为而为”强调了对社会的责任与介入,那么“为而不有”则是强调了这种责任与介入的人生境界。正是通过趣味,梁启超实现了“对于美的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其人生实践的现实步履水乳交融”。[12]

其五,梁启超的趣味美学,不仅是一种美学理论,更是一种美学实践。金雅指出,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趣味,它首先是“一个审美的范畴”,即在审美之维内论述趣味;但同时,它又不是“一种纯审美的判断”,不是“一个纯审美的范畴”,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指向性,“是一种融人生实践与审美实践为一体的具体感性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是一种由情感、生命、创造所熔铸的不有之为的精神自由之境”。在这种趣味之境中,感性个体的自由创造精神,与宇宙众生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并获得“酣畅淋漓之‘春意’”,从而真正实现有责任的兴味即趣味。因此,梁启超的审美趣味,不是一个纯审美的问题,而是对美的价值哲思与学术研究的统一,体现了梁启超的社会现实责任感,[13]它既是美学理论的创构,更是生命的实践与生存的状态。

二

梁启超与王国维同为中国现代美学的最早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美学史上,能够与王国维“比肩”的大家唯有梁启超。[14]但是,两人的学术待遇却迥异,学术界对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非常充分,也非常深入;但是,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研究却一直停滞不前。就这一点来说,作为第一部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专著,金著的突破性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但需要追问的是,金雅的梁启超趣味美学的判断,是否符合梁启超美学活动与美学著述的实际呢?我的答案是:表面相似,实质背反。

先说表面相似。所谓表面相似,是指金著关于梁启超趣味美学的五个判断基本上能忠实于梁启超美学论述的实际现实。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的建构,确实经历了前后期的巨大变化,且其理论建构重心在于后期。[15]梁启超美学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完全可以用趣味来概括,这是梁启超在其演讲著述中反复致意的;梁启超的趣味美学,确实与人生价值密切相关,指向人的人格境界与生存状态,具有人生美学的品格与人生实践性的特征。[16]金雅关于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这些分析,表面看来,与梁启超的美学著述确实非常贴近。

再说实质背反。所谓实质背反,是指从梁启超美学活动与美学著述的目的与旨归来看,金著与其背道而驰。我们需要提问的是:梁启超构建趣味美学,其目的是否就是为了实现人生目的呢?我们不妨沿着梁启超美学思想发展前后两

期的轨迹作具体探析。

梁启超早期美学主要表现为文艺美学,即三界革命论。梁启超提倡三界革命,其目的是什么呢?在诗界革命论中,梁启超提出诗歌三长: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其核心则是以欧洲之意境、语句替换中国传统之意境、语句。那欧洲的意境又是什么呢?他明确说道:他虽然不擅长作诗,但是他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作为"诗料";并且认为,只有经过这种欧洲精神之革命,中国才不会诗运殆绝。[17]因此,梁启超说的诗歌新意境,就是要输入的欧洲之精神思想,即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等现代政治观念,直接指向政治之目的。在小说界革命论中,他极力提倡新小说,认为要新一国之民,必须先新一国之小说;道德、宗教、政府、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等之新,也都必须通过"新小说"来实现。[18]在梁启超那里,小说不是怡情养性的纯艺术,而是政治宣传的载体,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他大力提倡小说,正是看重小说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界革命论中,梁启超提倡"觉世之文""应时之文",反对"传世之文"与"藏山之文",认为传世之文或"渊懿古茂",或"沉博绝丽",或"瑰奇奥诡",三居其一即可达到传世之目的,但都不是以普通世人为阅读对象;觉世之文只是辞达而已,只要条理细备、词笔锐达即可,不必追求精雕细琢,并引用司马光的话说"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19]所以他说我们写文章,不能有藏之名山以俟诸百世之后的想法,而应该根据社会形势发其胸中所欲言。[20]他讲的传世之文、藏山之文,是指纯审美性的文学或纯学术性的学问,觉世之文、应时之文,则指向解决社会、国家问题的实用写作,简单说就是政论文。从目的来看,梁启超早期的文论,小说论也好,诗论也好,散文论也好,都不是提倡纯文学或纯学问,而是将文学作为实现政治宣传目的的工具。

那梁启超后期的趣味美学,是否彻底抛弃了早期政治功利性,走向了人生无功利性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仔细研究梁启超前后期思想转化的过程,以及梁启超趣味美学的建构目的,就会发现其有着更耐人寻味的宗旨。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抱着极大的自负与自信返回国内,直接从事中国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将其平生所学付诸政治实践。但是,共和党国会竞选的失败,司法总长与币制局总裁的执政失败经历,让梁启超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仅有政治制度的设计,并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社会;没有新人的国民性参与,再好的制度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执行,大家都蝇营狗苟于自己私利,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设出一个良好的新中国。早在 1913 年,他就对中国革命后的政治再造实践非常失望,说革命后一年来"所见者惟个人行动","未尝见有国家机关之行动与团体之行动","而今之尸国家机关及为各团体员者,皆借团体机关为达私目的之手段也"。[21]其原因,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分析道:"则中国社会之堕落窳败,晦盲否塞,实使人不寒而栗。以智识才技之晻陋若彼,势必劣败于此物竞至剧之世,举全国而为饿殍;以人心风俗之偷窳若彼,势必尽丧吾祖若宗遗传之善性,举全国而为禽兽。"[22]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要真正建立起现代民主国

家,不是光靠上层政治制度设计能够解决,而必须实行道德启蒙,即提升国民道德素质。这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后期工作的直接目的。

梁启超的趣味美学必须放在这个政治的目的与宗旨中考察。这一目的,梁启超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吾自今以往,吾何以报国者?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23]梁启超认为,以后中国最大的隐患就是“学问不昌”与“道德沦坏”,所以“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不可,否则“国势将不可救”,并说自己今后将献身于此。[24]

因此,从直接的理论阐释来看,梁启超的趣味美学将艺术与人生价值勾连,其宗旨似乎就是人生美学,这与西方柏格森、叔本华以及王国维基本相似。但是,从趣味美学构建的最终目的来看,它其实服务于梁启超的政治总目的,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与工具。当然,梁启超后期趣味美学时期的政治框架与模式,与早期三界革命论时期迥异:早期是政治→制度/执政→文学这一政治解决模式,即政治问题通过自己执政设定政治制度来解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框架模式是:文学→政治,在这一框架中文学的功能是宣传政治,这是依附性的工具论、服务论文学观;趣味美学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框架模式是:改造社会(政治)→趣味人生(道德)→文学/美学(路径与方法),在这一框架模式中,文学与审美功能是:文学与审美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形成趣味人生。这样,通过趣味,梁启超将艺术、审美与社会改造、政治实践连接起来,即社会改造的政治目的只有通过国民的道德提升(趣味人生的生成)才能真正实现,而国民道德的提升只能通过艺术的提升与超越才能达成。

因此,无论是早期的三界革命论,还是后期的趣味美学,梁启超都不是将文学与审美看作纯艺术、纯审美来研究,而是从政治功用的角度来考察,将其放在解决中国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框架中来研究。梁启超首先是位政治家,他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上研究文学与审美,这是他看待、研究文学与审美的独特之处,这就决定了他所构建的美学,不同于王国维等纯美学家的理论。王国维等人的纯审美研究,是将审美与政治对立起来,研究文学与审美的独特价值,这种研究思路与模式可称之为政治审美二元对立模式,其成果是纯美学;梁启超的研究思路与模式,是将美学置于政治这个根本目的与宗旨中考察,是政治与审美的交融,这种研究思路与模式,可称之为政治审美二元融合模式,其成果可命名为政治美学。政治美学,才是梁启超趣味美学的真正品质。

三

金雅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梁启超趣味美学的不纯粹性。她评价梁启超前期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说,梁启超在小说的审美功能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过度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他将审美

功能工具化,把小说的社会功能看作小说的终极功能,从而扭曲了小说的审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主次关系。[25]她对于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政治宣传目的也非常熟悉,认为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是将著书立说这一行为与社会变革直接联系起来,要求文人自觉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并把政治宣传与思想启蒙的社会效果当作著述的首要目的。[26]

对于梁启超后期趣味人生美学背后潜伏的社会改造的政治目的,金雅也并不陌生。她说,"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五四'以后的梁启超已由一个职业的政治家转变成一个纯粹的不问政事的学者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后期梁启超已由一个关心政治的功利主义者转变成潜心书斋的超功利主义者的结论"。[27]梁启超欧游目的,就是出于对国内政治现象的不满,他"看不到光明","因此想赴欧洲'拓一拓眼界''求一点学问'""实际上也是想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寻找一条新的出路"。[28]梁启超前后期美学变而不变的深层质素,就是他"对于强民富国之路的不息探寻","这种探寻一方面构成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价值根基","另一方面也成为其不断探索与追求的内在动力"。[29]因此,"爱国主义始终是梁启超生命活动中高扬的一面旗帜","也成为他努力建设'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的强大动力"。[30]她还引用了梁启超学生李仁夫回忆的梁启超原话来证明这一点:"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31]

那么,为什么金雅一方面认识到了梁启超美学的不纯粹性,另一方面还要将其纳入纯美学的评价体系,以人生美学来界定其品性呢?这是因为,金雅的美学评判逻辑起点是:审美政治二元对立论。所谓审美政治二元对立论,指将政治功利与审美无功利对立起来,通过与政治功利性的对立与背反以确立审美的无功利性,以及自己的独立价值与研究领域。

审美政治二元对立论源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康德认为,纯粹的鉴赏判断即审美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32]即没有任何功利性。康德讲的无功利性,是与欲望功利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与政治功利相对,即审美与欲望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由于我国政治功利性的强大势力,王国维等人引进康德的无功利美学后,将康德的欲望无功利转化为政治无功利性,形成了审美与政治相对的概念。王国维直接将政治与文学相对、政治家与文学家相对,认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其原因有二:其一,"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显然,精神的利益远远大于物质的利益;其二,物质上之利益是一时的,而精神上之利益是永久的,永久的精神利益其作用显然远大于一时的政治之利益。[33]所以,王国维强调,"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因为"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而"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34]这样,王国维就将康德的审美—欲望对立模式的审美无功利性,改造成了中国式的审美—政治对立模式的审美无功利性。

在审美政治对立模式的无功利性美学思维模式中,审美的独特价值是通过与政治的对立与背离即在政治的否定中获得的。因此,政治审美二元对立论可以评价王国维等纯美学家的理论,用来评价梁启超的政治美学却使自己陷入两难的窘境:如果承认梁启超政治美学的价值,那么就否定了其评价标准,使得自己的批评失去了衡量的准星;如果否定了梁启超政治美学的价值,那么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研究对象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那金雅是如何应对这个窘境的呢?她主要采用了两种策略:一是打揉评价,二是误接误读。先看打揉评价。所谓“打”,是指批评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政治功能论。如评价《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说,梁启超这篇文章对小说的审美功能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偏颇,一方面过分夸大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将审美功能工具化,把社会功能当作小说的终极价值,从而扭曲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之间的关系。“揉”即表扬其美学特性论。“打”过“政治功能”论之后,金雅又评价了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力”,认为梁启超提炼的小说的“熏”“浸”“刺”“提”,“渐”化和“骤”觉两种基本作用形式,“自外而灌之使入”与“自内而脱之使出”两大作用机理,从小说艺术特征和读者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小说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式与途径,“体现了梁启超深厚的艺术功底”,也使得他的美学思想“呈现出较为丰富的美学内蕴”。[35]一打一揉,看似对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优点与不足都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但我们还是无法明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究竟因政治功能论而不该进入纯美学理论,还是纯审美理论是否要突破政治无功利论?这一评价,看似公允,实质两相抵销,并没有对梁启超小说理论的价值作出明晰的、令人信服的评价。

所谓误接误读,是指从梁启超政治美学的论述中寻找、挑选纯美学的论述,将这些范畴、论述与纯美学对照,并组合、拼凑成所谓的纯美学理论体系。金雅明明已经发现了梁启超早期小说美学与后期趣味美学的政治功利性,但是,从政治与审美对立的纯美学标准出发,她无法发现梁启超建构的美学是政治美学。于是,她就从梁启超的趣味论述中寻找、挑选纯审美理论中的趣味、人生、情感,同时弱化梁启超小说美学中的政治功利性,突出其情感影响力,搭建了以趣味为核心范畴、人生价值为宗旨、情感为核心内容的梁启超趣味人生美学体系,故意忽略梁启超美学的政治指向性,将梁启超的政治美学嫁接在纯美学的人生美学植株之上。

这种打揉评价与误接误读,乍一看,似乎符合纯审美的理论体系,而且其批评与肯定都切中肯綮。但是,只要跳出这一理论体系之外,阅读梁启超的著述并追问,梁启超的趣味美学的构建,真的是要搭建一个王国维式的纯审美的理论体系吗?这时我们就会直觉到,金雅构筑的这一纯审美的趣味人生美学,恰恰与梁启超自己的美学著述目的背道而驰,看似华丽辉煌的梁启超美学大厦,却并非建立在梁启超自家的美学宅基地之上。

梁启超的美学,是政治审美二元融合的政治美学,具体表现为前期的工具论

"政治"美学,后期的本体论政治"美学",这才是梁启超美学的真正品质,也是他政治美学发展演变的轨迹。金雅建构的梁启超趣味美学,其理论出发点是政治与审美二元对立论,当然无法真正进入梁启超的政治美学,也无法对梁启超的政治美学作出符合其本身特性的评价。

注释: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647 页。

〔2〕〔31〕夏晓虹:《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第 218、346 页。

〔3〕〔14〕王元骧:《序二》,载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4 页。

〔4〕聂振斌:《序三》,载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9 页。

〔5〕〔6〕〔7〕〔8〕〔9〕〔10〕〔11〕〔12〕〔13〕〔25〕〔26〕〔27〕〔28〕〔29〕〔30〕〔35〕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6、6、12、46、224、5、6 – 7、5、60、49 – 50、157 – 158、234、54、230、234、49 – 50 页。

〔15〕不过,关于前后期的划分,我不同意金雅的观点。梁启超美学思想前后期划分的界限,应该是 1915 年发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梁启超趣味美学的著述,确实主要发生于欧游前后。但是,梁启超这一思路,早在发表此文时已经基本确立。梁启超在本文中明确提出,自己以后要脱离以前的"政治生涯",从事"在野政治家"工作即社会教育,只不过后来因袁世凯复辟等事件而一再耽搁。

〔16〕1922 年 4 月 10 日,他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所作讲演《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提出,他信仰的就是趣味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甚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甚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他在《学问之趣味》中又说道:"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何用?……我一年到头一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生活。"

〔17〕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219 页。

〔18〕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884 页。

〔19〕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109 页。

〔20〕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 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148 页。

〔21〕梁启超:《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587 页。

〔22〕〔23〕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805 – 2806 页。

〔24〕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第 2930 页。

〔32〕〔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册),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40 页。

〔33〕王国维:《文学与教育》,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下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年,第 36 页。

〔34〕王国维:《人间词话 · 删稿 · 三十七》,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上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年,第 90 页。

〔责任编辑:黎　虹〕